

谭君强 降红燕 陈芳 王浩 著

审美文化叙事学

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谭君强 降红燕 陈芳 王浩 著

审美文化叙事学

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 / 谭君强，降红燕，陈芳，王浩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5161 - 0012 - 7

I. ①审… II. ①谭…②降…③陈…④王… III. ①审美文化—叙述学—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07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前 言

1993年8月，在译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一书后，我为该译著的出版撰写了“译者前言”。在对叙事理论作了简要介绍与评析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与传统的文本批评理论一样，叙述学完全割裂了叙事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创作主体等的关联，而将叙事作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这自然为这种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带来了某些弊端。……指出叙述学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决不是要否定这种理论独特的价值，也不是要抹煞它与其他批评理论的区别——一种新的理论的建构，有时往往要将其某些特征推向极端，以使其在理论批评的潮流中独树一帜——而是要指出，我们大可不必在运用叙事理论分析叙事作品时陷于孤立化、绝对化。叙述学理论毕竟只是理论潮流中的一种，尽管是十分有价值的一种。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完全可以将它与其他批评理论，包括社会、历史的批评结合起来，这样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而又能避免某些片面性。^①

① 谭君强：《译者前言》，见〔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对叙事理论的这种看法与切身感受,是我在此前对叙事学进行研究与实践运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我开始接触叙事学理论,进行叙事学研究与叙事作品分析时,就对叙事学有意将其范围限定在叙事文本之内、而完全切断与外在关联所产生的局限性有所认识。可以说,叙事学理论的这一特征,既是它的长处,因为它善于在文本之内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撇开了主观臆测所带来的随意性;但同时也是它的短处,因为文本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与环绕它的外在要素割裂开来的,人为割裂的结果势必造成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尽管有时或许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任何理论都无须对之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理论本身是用以对丰富的实践进行说明与阐释的,当一种理论不足以对实践进行有效的分析与阐释时,不妨首先对理论进行探讨,对其作必要的修正、补充与调整,或者将一种理论与其他行之有效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以加强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在进行叙事学研究与叙事作品分析时,我所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随之出现的便是,无论在理论探究还是叙事作品分析中,都注意充分挖掘叙事学有益的理论资源,同时,又往往超越叙事学的某些理论成规,在必要的时候,将叙事文本与不同的外在要素连接起来,并且不回避叙事学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有益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所发表的对鲁迅小说的叙事分析与探讨中,就贯彻了这一研究思想。而到21世纪初,在这一研究思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则明确地将叙事学与外在的语境结合起来,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的构想,这实际上是文本语境与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语境的密切结合。在提出这一构想之后不久,我所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于2003年获准立项,这就为这一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理论探讨与对各类叙事作品

的分析,“审美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得以在研究中不断展开,本书所呈现的就是多年来围绕这一理论路向研究的结果。

“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应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从总体上来说,这一研究是在延续、扩展叙事学研究行之有效的传统,沟通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新的拓展,就叙事学研究中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从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入手,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究,以期补充与深化既有的叙事理论研究,为开拓新的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领域作出贡献。

回顾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与延续着。这一发展中可以看出两个相互有着密切关联,又有明显变化的阶段,这就是叙事学界所称的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开创了叙事学的基础理论,奠定了叙事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它的特点就在于将研究的范围限定于叙事文本之内,专注于一种按照二元对立原则所界定的形式概念或范畴展开研究,而不考虑它与超越叙事文本这一范围的外在关联。正如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罗彬·沃霍尔所说:“[热奈特(Genette)]从未暗示过在叙述结构间有可能存在任何基于性别的差异或模式。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和米克·巴尔在他们更具普泛性的叙事学论述中,都没有提到作为他们所描述模式之影响因子的性别。不仅是性别,所有语境的变量都被排除在经典叙事学领域之外。作为结构主义的支持者,叙事学的首批实践者把文本从相应的语境中分离出来,以便从中提炼出所有叙事都具有的基本的结构。”^①经典叙事学

① 转引自申丹《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杨莉译,《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在涉及叙述或叙事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时是如此,在涉及叙事文本与其他诸多的语境关联中也同样如此。正由于仅仅考虑这种共时性特征,完全摒弃了其历时性意义,也就势必使经典叙事学注定成为一种囿于文本范围之内的形式研究。这也是经典叙事学在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而缓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伴随文化研究的盛行,叙事学在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在文学研究中,将叙事学的模式与源自于文化研究的概念结合起来必定形成为后经典叙事学范围内的研究。”^①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中,叙事学跳出了长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事文本之内的封闭式研究的窠臼,真正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叙事文本范围之外。“作为对文本-中心阐释的一种批评性反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将文学重新历史化、重新语境化。”^②这样一来,叙事学与诸多语境要素相关联,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沟通,由此出现了叙事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在这一过程中,叙事学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摆脱了将自身限制在文本之内的樊笼。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对“叙事学”这一理论的理解上所出现的明显变化。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美国学者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1999年在谈到“叙事学”时,曾明确说道:“我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叙事学’一词的,它大体上可以与‘叙事研究’相替换。这种宽泛的用法应该说反映了叙事学本身的演变……‘叙事学’不再专指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现在可以指任何根据一定原则对文学、史籍、谈

①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89.

② Ibid. .

话以及电影叙事形式进行研究的方法。”^①赫尔曼对“叙事学”的这种理解，不仅反映了后经典叙事学时期的客观状况，也为叙事学的发展拓宽了路子。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曾经说道：“科学哲学家们已经一再论证过，对于任何一组已知的资料，总可以建构出一个以上的理论。”^②对于同样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并各自取得其有意义的结论。美国学者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在其《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一书中，同样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亨利·詹姆斯的《艾斯朋遗稿》、托妮·莫里森的《蓝眼睛》以及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歌作为对象，分别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历史主义等不同理论角度来进行解读，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其不同理论角度之间的研究与分析显然是不可相互替代的。^③对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这样属于同一理论渊源的不同阶段的理论发展，其不同阶段各具不同重点与范围的研究，自然也会显示出各自的理论合理性、不可替代性，以及其合理发展的内在必要性。

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不难看到它在力图扩大自己研究范围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表现在与文化研究这一

① [美] 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②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③ 见[美] 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赵炎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潮流休戚相关的对于众多对象,包括对于所谓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研究上,也表现在它力图超越纯粹的文本范围,而将文本与围绕文本的语境相互结合的研究上。这一点甚至成为后经典叙事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叙事学依然存在,并和后结构主义一道发展着。叙事学的存活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各种语境或后经典叙事学的出现。”^①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对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在新的层面上大为扩展。在这一扩展中,对语境的重视显得十分突出。在文化研究的提倡者看来,语境的考量已经成为一个中心性的问题:“语境决定特殊主体形式的意义、变化或特点,正如决定这个形式自身一样。语境包括上面描述的各种文化特征,但也包括直接环境的语境(如家庭环境)或更大的历史语境或时机。”^②因而,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扩大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寻求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联,不仅恢复了叙事作品与外在的各种语境之间的客观联系这一本来事实,体现了科学的叙事学研究的要求,同时也是叙事学研究能一以贯之地延续下去的有力保证。

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研究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2009年,德国吉森大学教授、被视为“目前德国最主要的叙事学家”^③的安斯伽·纽宁(Ansgar Nünning)从不同的语境意义出发,凸显出叙事学的不同取向,列出了复数形式的所谓“诸语境叙事学”(Contextualist Narra-

① 申丹:《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杨莉译,《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② [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③ Monika Fludernik,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07.

tologies)。他概括了这一复数形式的语境叙事学的如下 16 个类别，分别是：

1. 语境叙事学 (Contextualist Narratology)；
2. 叙事学与主题学 (Narratology and Thematics)；
3. 比较叙事学 (Comparative Narratology)；
4. 应用叙事学 (Applied Narratology)；
5. 马克思主义叙事学 (Marxist Narratology)；
6. 女性主义叙事学 (Feminist Narratology)；
7. 同性恋与酷儿叙事学 (Lesbian and Queer Narratology)；
8. 种族叙事学 (Ethnic Narratology)；
9. 跨文化叙事学 (Intercultural Narratology)；
10. 后殖民叙事学 (Postcolonial Narratology)；
11. 社会叙事学 (Socio-Narratology)；
12. 认知叙事学 (Cognitive Narratology)；
13. 自然叙事学 (Natural Narratology)；
14. 新历史叙事学 (New historical Narratologies)；
15. 文化与历史叙事学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
16. 历时叙事学 (Diachronic Narratology)。^①

这显然是从不同的语境出发所列出的、具有十分宽泛意义的叙事学的形态与种类。安斯伽·纽宁在每一类不同形式的叙事学类别中均列出了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名字。与其他的西方研究者一样，安斯伽·纽宁所注意到的基本上都属于西方学术界、出自以西方语言进行的研究，其眼光未越出西方学界的范

① Ansgar Nünning, "Surveying Contextualist and Cultural Narratologies: Towards an Outline of Approaches, Concepts and Potentials", In Sandra Heinen, Roy Sommer, Eds., *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mpany, 2009, pp. 54 - 55.

围,完全未注意到中国学者在叙事学领域中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①我们所致力“审美文化叙事学”(Aesthetical-Cultural Narratology),显然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它有别于纽宁所概括的上述16类叙事学研究,完全可以在所谓“语境叙事学”中具有自己的地位。

就“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要创立与叙事学,尤其是与经典叙事学完全不相干的一门新的叙事学理论,相反,这一研究仍然涉及叙事学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与问题,如叙事、叙述者、叙述声音、叙述聚焦、隐含作者、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性、作者、虚构、形式、文本等,所有这些问题在叙事理论的构架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既与经典叙事学相关联,同时又进行新的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在叙事理论发展的构架下,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换的过程中,在审美文化的观照下,在理论与作品实践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探讨涉及叙事学理论与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叙述者与意识形态、叙述聚焦与性别意识、文本与语境等。同时,与当代叙事学注重对一些新的研究对象展开研究相应,也对多媒体时代的新的

^① 美国宾州库兹城大学哲学系黄勇在谈到比较哲学研究时提出,“语言成为英语世界哲学研究的弊端”,“被引进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很少讨论中国学者在相关的中国哲学问题上的研究”。他举例说:“一个西方学者在写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和著作时,他们往往会尽可能网罗与自己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所有英语文献,甚至豆腐干大的文章都不放过,但对于当代中国学者就相同问题所写的洋洋巨著,则可以完全置之不顾,而出版社和杂志社也不加要求。”(见黄勇《中国哲学研究的全球化:比较哲学与学术交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这种情况,不仅在哲学界是如此,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均不例外。西方叙事学界除对中国学者以英语撰写的论文引起关注外,对中国学者以中文撰写的叙事学研究几乎一无所知。

叙事文本展开探讨，研究诸如网络小说的叙事特征与审美意义，电影的叙事时间与审美意义等。尽管这些问题并未涵盖叙事学的所有重要理论问题，但无疑是叙事学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深化自己的研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不可少的重要问题。

叙事学在它发展中，十分注意理论与作品实践的结合，注意以理论对作品进行阐释，这种对叙事作品按照叙事学的模式与范畴所作的研究，已经被包括在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内，形成叙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后经典叙事学时期的研究趋向中，这种状况实际上更为突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研究趋向。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同时也通过对具体的叙事作品所作的叙事分析将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以具体的叙事作品作为对象，按照叙事学的模式与范畴，通过摄取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在我们看来，理解叙事学理论，包括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目的，一方面当然在于掌握理论，但叙事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而，在理解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对它的实践运用，这样反过来又可以加深对理论的洞见。我们的研究中所包括的一系列对作品的叙事分析，也试图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现代叙事学作为 20 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应该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引入国内文艺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与其他诸多引入的理论不同的是，叙事学直到现在一直成为文艺理论中一种流行的理论，受到广泛的关注。人们不仅试图对叙事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并且也试图探寻中国文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叙事理论的资源，同时，运用当代叙事理论来对作品进行分析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对叙事理论的关注，在 21 世纪的开头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延续。自 2003 年以来，已先后由

漳州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外语学院举办了四届全国性的叙事学研讨会。后两届大会同时也是国际会议。2009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共有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出席了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叙事学前沿理论的探讨、叙事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跨媒介叙事研究,以及用叙事学的方法重新阐释叙事作品等。中国学者与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挪威等国的叙事学家在会上发言,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正是在这次会上,笔者作了《构建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大会发言,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

最近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由湖南师范大学举办,于2011年10月19日至23日在长沙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一百余位学者与会。在会上,11位中外学者作了大会发言。^①会议按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分

① 作大会发言的学者及论文题目按发言顺序分别为: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教授詹姆斯·费伦 (James Phelan): “Why Aren’t Characters Part of th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Model?” (《为什么人物不是叙事交流模式中的一部分?》); 2. 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3. 法国图尔大学教授约翰·皮尔 (John Pier):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 Few Reflections” (《经典和后经典:一些思考》); 4. 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影子作者”》; 5.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简·贝特恩斯 (Jan Baetens): “The Photo-novel: More than a Comic Strip with Pictures” (《影像小说:不只是连环画》); 6.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教授杰拉尔德·普林斯 (Gerald Prince): “Remarks on Narratology and its Future” (《叙事学及其未来》); 7. 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论叙述者》; 8. 美国学者、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康士林 (Nickloss Koss): 《从叙事学角度审视〈红楼梦〉与〈米德尔马契〉》 (A Narratological Look at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Middlemarch*); 9. 云南大学谭君强教授:《李维〈秋山论文〉中的叙事论:比较叙事学研究》; 10. 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莫妮卡·弗鲁德尼克 (Monika Fludernik): “Factual Narrative: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叙事学视角中的事实性叙事》); 11.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龙迪勇研究员:《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别以“叙事理论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研究”、“非文字媒介和非文学叙事研究”、“用叙事学的方法重新阐释叙事作品”为主题，分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无论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气氛都十分热烈，显示出对叙事学研究的关注。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在 2004 年于武汉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上已经成立，并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而全国性的中国叙事学会学术网站（<http://www.narratologies.com.cn/>）也于 2010 年开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在相关系科的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阶段开设了叙事学课程。至于所出版的涉及叙事学的著作、学术刊物所发表的有关叙事学的论文也源源不断地涌现。所有这些，都说明叙事学理论受到关注的程度，也说明叙事学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

近 20 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的领域一直十分活跃，并力图在加强与国际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交流、对话与互补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愿望在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有中国学者认为，“在建构超越西方模式的中国叙事理论方面，从新世纪以来的种种迹象可以发觉，概而言之，融合叙事学与文体学的‘整体－细读’法（申丹，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挖掘叙事空间维度的空间叙事理论（龙迪勇，spatial narratology）、窥探叙事政治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胡亚敏，ideology narratology）、纳非文字媒介叙事入研究视域的广义叙事学（赵毅衡，general narratology）和关注审美价值判断的审美文化叙事研究（谭君强，aesthetical-cultural narratology）等五种批评理论构想，是中国学者付出努力后所收获的成果”。^①

^① 胡俊飞：《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第 15 期。

希望我们所进行的这一研究,能够对于推动国内叙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点作用,对于推动与国际叙事学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够作出一点贡献。同时,也希望借此书的出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学界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为参与“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员的共同研究成果,该项目已在2010年结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1年5月10日在其网站上对该项研究作了“成果简介”,^①并将其收入2011年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七辑。^②本书在结项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最后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项目中的部分内容已在笔者200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一书中出现,因而,在该书中基本上加以省略。但考虑到阐释“审美文化叙事学”这一理论构想的完整性与个案分析的代表性,在前述《叙事学导论》一书中出现的少量内容也出现在该书中,不过,均进行了重新修订。

以下按出现在该书章节的先后顺序列出各撰写人所承担的具体章节:

谭君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一、二、四、五、六节,附录;并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与构思,以及全书的统稿;

① 见 <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06/219508/219525/14600715.html>。

② 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436页。

降红燕（云南大学教授）：第四章；

陈芳（云南大学教师，博士）：第五章，第七章第三节，
参与第二章第三节；

王浩（云南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生）：第六章。